

# 开拓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刘笑敢

“中国哲学”这一概念进入学府、学界约有百年历史,这是一个在古今中西思想潮流交汇激荡中地位特殊的学科和领域。物理、化学可以全部以西方教材为规范,不必理会中国本土的物理、化学知识;而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似乎不理睬西方文学、西方历史理论也可以立足于学林。但是,中国哲学却不同,研究对象或基本材料是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文献,而研究论说所用概念、理论、语言却是从西方引进。有美国同事问,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无所谓中国不中国,为什么哲学就要讲是不是中国哲学?这显然是因为物理学所研究的固体、液体、气体、原子、粒子无民族之别,而儒释道就不能说没有民族特点。于是,显而易见或隐约可见的是对儒释道的研究进路、课题、方法往往随着西方哲学及相关学科的翻新而起伏跌宕,如儒家的自我观、儒家的身体观、儒家的女性观,以及儒家的德性伦理等等。这些引进和借鉴或多或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所推动,但中国哲学到底应该如何研究,哪些角度和方法更适合儒释道的传统,其中还是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思考。

问题之一是中国哲学如何面对自然科学的成果。中国人关于道德的思考和推理要不要吸收经验科学的发现,要不要接受科学实验的检验?本辑所刊载的主题论文就是探讨如何从逻辑推理和实验科学的角度研究儒家伦理以及道家的无为,这中间涉及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人类的道德活动是不是纯理性的选择、道德意识是不是纯逻辑的推理。在美国,有不少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的来源与机制,这促使哲学家对传统的理性主义的道德理论开始反思: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跟活生生的个人,跟生理、心理、脑神经活动是否有密切联系?一些哲学家也开始借用认知科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国哲学。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柏啸虎(Brian Bruya)教授慷慨允诺担当本辑专栏的特邀编辑,邀约了四篇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

第一篇是黄百锐(David B. Wong)讨论孟子关于道德推理之方法的

文章。作者强调,在西方近代哲学传统中,无论是康德主义还是功利主义的道德推理都是自上而下、由原则到实例,这一推理模式主导着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将这种推理模式运用于中国哲学研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把一种不存在的想法读入中国思想家之中,以为他们接受一种从上而下的模型”,将中国思想同化于西方传统中有偏颇性的推理模式。第二,认为中国“思想家根本没有任何道德推理”,有的只是“一些原始质朴的直觉”。作者的这种分析再次提醒我们不应盲目地奉西方模式为中国哲学之圭臬。众所周知,孟子曾劝说齐宣王将对牛的不忍之心“推恩”于天下百姓,此即孟子扩充个人之仁心的学说。关于这种“扩充”的方法,黄教授总结出两种既有的解释方案,即“逻辑扩充”和“情感扩充”两类,黄教授认为这两类关于扩充的解释都有缺陷,建议在二者之间寻找思考的空间,并由此提出“发展扩充”的解释方案,主张把天赋的道德感理解解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塑而不确定的本能感受。对这种解释方案也有不同意见,黄教授对各种意见都作了详细的分析与回应。有些读者可能感到这些讨论繁琐而细碎,或者不必要,但笔者却非常欣赏这种同行之间认真对话切磋的态度,缺少这种态度,大家都自以为是,就没有对话,或者是聋子的对话。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黄教授从心理学关于非正式推理以及直觉推理的最新研究进一步阐发了如何理解孟子和荀子之道德推理的可能性。作者的结论是:“道德无须始于创制一般规则,然后从上而下地推导出具体道德判断。毋宁说,道德作为人为创造,始于具体,而一般则从对具体的反省中推导出来。……孟子关于道德推理的种种洞见,可以交织进一个完全自然主义的观点之中,以说明人类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

第二篇是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的长文,他以大量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以及灵长类学之研究报告为根据,分析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传统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不足。比如,康德认为,一个人如果“出于倾向”(out of inclination)而诚实并不能视为真正的诚实;真正的诚实必须是有意识地“出于责任”(out of duty)的行为,而非单单“顺从责任”(in conformity with duty)。但是,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角度看,康德主张的道德行为可能是勉强的、不够真实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应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森舸澜特别引入心理学的“不费力注意”(effortless attention)的概念研究儒家德性伦理中

的特点,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为”。作者引《论语》中的大量言传身教的实例说明:“经过一番实践传统文化的训练后,儒者能驾驭情绪,并由内心自发地实践德行。这即是说,一个在德性上力臻完美的人行合宜之事的时候,并不需要经过有意识的思考或能力,而是由‘不费力注意’带领着自发进行的。”这也就是本文标题中所强调的“迈向经验上可信赖的伦理学”。

第三篇柏啸虎的文章将道家“无为”的观念与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这里的无为也是“不费力注意”(effortless attention)的意思,同时作者也将无为与行为心理学家的“自成目的的体验”(automatic experience)或“心流”(flow)相比较,意指“活动本身的条件促进了行为的发生,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进行一项活动的时候,似乎行动本身发生得毫不费力”。作者认为在老子和庄子中,无为的特征是“看似或者感觉起来好像不费吹灰之力、涉及习得的活动及自我意识的减弱”。西方哲学传统的观点认为“必须要有努力,才可能控制注意力”,而“无为”或“心流”的立场与此有重要不同。作者的立论根据主要在于《庄子》书中许多关于高超技巧的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斲轮、梓庆削鐻、佝偻承蜩等等。作者援引最新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各种高超技巧的表现和“无为”活动间似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对高超技巧的学习往往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极大的努力,但技巧的表现到了最高层次的时候,行动者往往并不觉得费力,而在旁观者看来也似乎是轻松不费力的。作者将这种无为理论概括为完整性(wholeness)和流畅性(fluency)两大范畴,并有更细致的分类和描述。

第四篇是沙启善(Hagop Sarkissian)关于情境伦理的文章。哲学家一般相信一个人的善恶决定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有何价值观和性格品质等。但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大量情境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和观察对这一信念提出了严重挑战。情境因素,即使是细微的因素,都会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产生超出想象的影响。比如医药公司的小礼品会改变医生的处方方式,而自愿报名的实验者一旦被随机分为狱卒和囚犯,几天内就发生了监狱和囚徒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致实验很快被迫停止。大量情境实验的结果严重挑战了人格理论和德性伦理学的信念。沙启善在分析这些实验结果之后提出,人们会在特殊情境中改变自己的言行,但人们也可以通过微小的改变而改善外在的情境。情境与个人是相互影

响,既不是隔绝的,也不是只有单向影响的。因此,情境论的发现也可以变成对德性伦理进一步发展的促进和契机,而未必仅是对个人主体性的挑战。

以上四篇文章都援引了现代经验科学的成果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在哲学上称之为自然主义进路。郑宗义的文章恰好为中国哲学研究与新自然主义的关系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述评。虽然文章是以个人思考为线索,但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与最新经验科学发现的关系有重要启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哲学是在真实世界之中的、面对真实世界的理论和思考,还是纯逻辑、纯理性的推理和判断体系。

孙卫民的文章也与经验科学有关。他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做了一个新的回答,这就是中国缺少演绎逻辑,仅仅依靠类比逻辑是无法建立一个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科学体系的。这里的理论科学是经验科学基础上的建构,而且归根结底要接受实验的检验,与哲学的理论建构当然不同。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近代的理论科学,却有着笼罩并贯穿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论建构,即五行系统。这种系统与科学体系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五行理论重在解释功能,没有自然科学诉诸实验、可观察、可验证的核心特征。王爱和的文章对中国传统的五行观的历史及其形态作了一个全面而扼要的考察。作者论证了五行学说的滥觞对于瓦解商周政治关系和构建新权力结构的重要作用,追溯了从四方结构到五行关联系统的宇宙观的改造过程。

以上文章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研究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从而帮助我们更宽、更广的视野考虑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观点与做法当然是自由而多样的,但重视来自于经验科学的发现、启示和挑战,无疑是拓展我们研究视野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辑另外收录了两篇专题论文。陈少明的文章讨论“四书”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而不是作为四部作品)的论说结构,和作者的很多文章一样,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思考视角。作者最后语意深长地提出,“四书”的论说系统发展到理学阶段,脱离了《论语》和《孟子》的实践性特点,变成了理学论说,那么它对促进儒家履行伦理职责与提高精神境界的目标,作用表现在哪里?

曾国藩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百年之后获得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敬

佩,是近代中国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大儒。蒋义斌的文章以曾氏日记为依据,剖析了曾的内心修养,以及与师友、经典和自我的对话。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曾氏先归程朱,后变申韩,在大病大难之际接受了友人欧阳兆熊“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的箴言,再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致成此巨功”。此事对我们重新思考所谓儒道关系当有重要启迪。

本辑“观潮屿”有梅约翰(John Makeham)的宏著。文章虽然不很长,却对20世纪以来以至当下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和有关方法的讨论作了概括而不空泛的回顾和剖析,同时也提出了他本人的独特见解。

“学思录”有幸发表冯达文教授的学术自述,文章有回忆,有理论,有创见,细而不繁,明而不浅,读其文可睹其人,而且可以进一步领略他大半生的学术成就之精华。

“新叶林”有郑泽绵关于庄子之“化”与“死”的文章。作者辨析了“化”与“变”的意义之不同,批评了宋儒解释之误,再现了庄子死亡观之要义,并有引申和说明。泽绵弃工学文,卓然有成,令人欣喜。

“会议录”蒙曹峰撰文报道去年的简帛与思想研究计划工作坊的概况,“回音谷”发表了笔者给一位业余学者的短信。纵观全辑,内容相当厚重,也多有新意,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以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2011年9月